

【唐】赵蕤著 陈伉译注

反经

与时俱进 学用反经
逆向思维 奥妙无穷
谋略权变 存乎一心
创业守成 就在掌中

新译
新注

八景九丘陰陽苗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

捷之辨枝 隹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

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

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

弘大凌轡御相譌吟豪傑戲萬乘

疇列如草莽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

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嘔吸冲

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世登仙神主造化



中国言实出版社

新译注

反
经

创业守成 就在掌中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译新注《反经》/[唐]赵蕤著;陈伉译注.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1

ISBN 7—80128—525—5

I. 新…

II. ①赵…②陈…

III. ①政治—谋略—中国—古代②反经—注释③反译—译文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111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编:100101

电话:64924761 64924716

E-mail: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航宇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960 毫米 1/16 32.5 印张

字 数 485 千字

书 号 ISBN 7—80128—525—5/D·179

定 价 36.00 元

《反经》治世名言

⊕ 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爲能;臣以能言爲能,君以能听爲能;臣以能行爲能,君以能赏罚爲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第4页

⊕ 智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警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快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欲观其亡,必由其下。

——第20页

⊕ 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恶亡国之失士。然犹授任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

——第40页

⊕ “罗其英雄,则敌国穷。”夫英雄者,国家之干;士民者,国家之半。得其干,收其半,则政行而无怨。知人则哲,唯帝难之。慎哉!

——第66页

⊕ 理国之本,刑与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也。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

——第101页

⊕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

——第152页

⊕ 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

——第173-174页

⊕ 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

——第220页



反 经 新 译 新 注



初 版 序

初版序

唐宋以来,有两本书历来作为领导者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为有政绩、有业绩的君臣将相所悉知:一本是从正面讲谋略的《资治通鉴》;一本是从反面讲谋略的《反经》。对于前一本书,统治者不但学习、运用,而且不断地宣传出版;对于后一本书,统治者往往只用不说,避而不谈。实际上,就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来说,《反经》在某种意义上比《资治通鉴》更具实用价值。

《反经》的作者赵蕤是唐代人,字大宾,四川籍。据史籍云,赵蕤“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妻俱有节操。”开元中召之不赴。有长短要术,“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譎之谋。”他站在万物正反相生这一哲学的大原则上,从另一角度考究历史上的人和事,看到历代统治者依据兴衰成败的教训总结制定的治国安邦之策,无论其多么完善严密,终究不能避免实施过程中的负作用。作者以精辟独到的立论,丰富深刻的历史事例,提醒当政者在制定、实施任何一项法规时,不要忘记历史的反弹。

《反经》的整体框架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交错纵横,蔚然成章。作者打破时空界限,从宏观上鸟瞰了上至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全貌,围绕权谋政制和知人善任这两个重心,时而引经据典,雄辩滔滔;时而运筹帷幄,驰骋沙场;时而审时度势,策划于密室;时而纵横捭阖,游说于诸侯。既有五侯争霸的刀光剑影,百子争锋,又有三国割据的金戈铁马,斗智斗勇。奇谋叠出,电击雷鸣。铺述历史,或则白描淡写,或则浓墨重彩。有理论上的探讨,有策略上的权衡,有人物的品评,有得失的反思。因此可以说,《反经》既是对唐以前历史的多角度、全方位的审视,也是历代政治创意与谋略之集成。《反经》付印后,乾隆皇帝亲自题诗云:



“鄞县创为救弊论，爱憎毁业匠和函。
向时虽类纵横说，忧末原归理道谈。”

宋刊弃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曰短长。
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

卷原称十今失一，总目翻看余一篇。
既是梓州善经济，不应辟召又何焉？

津瀛文苑继家声，四库集罗俾赞成。
邂逅世臣献遗简，向年论学忆西清。”

并亲自加注，概述此书主旨的原委。可见其重视程度。

现在，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关头，许多推进历史的战略性决策将出自我们之手。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反观《反经》振聋发聩的高论和令人警策的教训，对决心振兴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还是实业家——来说，都是必修的一课。

《反经》原文是比较艰深的古文，为方便读者，我们逐段进行了意译。对于原文，我们依据古籍整理的原则，不但力求保持原著的完整面貌，而且将作者原《序》置于卷首，后附《四库全书》的总编纪晓岚的《提要》。原著经文和作者的双行小注间杂并行。为示区别，我们在编排时，凡双行小注一律以[]标出，译文中对原注的翻译也以[]表示。

原文所引典籍，或许是由于作者的疏漏，或许是由于刊印时的舛错，时有衍误，我们都予以校勘，但为阅读方便，在正文中没有一一标注。

古人写文章，许多典故、历史人物、事件因在当时尽人皆知，故而行文特别简略。可是对于今人，就不知所云了。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未采用传统的注释形式，而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全部不留痕迹地体现在了译文中，读者在对比原文和译文时亦不难发现这一点。另外，对于其中一些今天的读者已不甚了了的历史事件，我们在翻译时做了适当的扩展，或者在译文的顺序上稍有颠倒，以便有助于读者对经文中的一些议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可能有悖于传统的翻译原则，然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好敬请读者体谅了。



反经新译新注



初版序



为了更好地体现“古为今用”，同时点明作者的主旨，我们间或以“按语”的形式对个别段落加以评述，意在与读者共同探讨商榷。但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法面面俱到。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学识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垂教。

陈 伧
1996 年秋



反
经
新
译
新
注



初
版
序



反 经 新 译 新 注



再 版 序

再版序

赵蕤其人

《反经》的作者赵蕤，是一位隐逸高人，唐明皇数征不起，他的生平事迹自然鲜为人知。我们现在只能从唐宋及后代的文史笔记中略知其一二。宋人孙光宪《北梦琐言》云：

“赵蕤者，梓州盐亭县（即今四川盐亭县）人也。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妻俱有节操，不受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

关于赵蕤的生平事迹，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和诗仙李白的关系。李白在《春感诗》并序中对他和赵蕤亦师亦友的关系有过明白的交待。

“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赋此诗。益州刺史苏颋见而异之。”

茫茫南与北，直道事难谐。

榆荚钱生树，杨花玉糝街。

尘萦游子面，蝶弄美人钗。

却忆青山上，云门掩竹斋。”

宋人杨天惠的《彰明逸事》几乎一字不易地引用了这首诗的序文。另有宋人笔记《广兴记》和《四川总志》都曾记载过李白与赵蕤的交往。李白自己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得更明白：

“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

将《春感诗》的小序与这封书信联系起来看，这位东严子自然就是赵蕤了。盖世诗仙对赵蕤因慕名而登门拜访，又与之朝夕相处有数年之久，隐逸山林，养禽自娱，朝廷和地方官屡征不起，当然不是来向这



位世外高人学习吟诗作画，而是来学《反经》，亦即王霸之术的。后来李白云游天下时，又曾在《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一诗中回忆了他与赵蕤当年非同寻常的深厚情谊及对自己四海飘零、事业无成的慨叹：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
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
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
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
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
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
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
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
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
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
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开元初，蜀人有“赵蕤术数，李白文章”的说法，由此可知赵蕤在当时是与李白同被视为蜀中双璧的。

关于赵蕤其人，历史留下来的记载实在太少。然而通过上述零星史料，我们不难约略窥见这位精通谋略的传奇人物有着怎样卑微六合、潇洒出尘的风采。

《反经》其书

清乾隆年间，有个叫周广业的学者，出于对古代纵横术的浓厚兴趣，从历代谋略专著中精选出两部，详加校勘付梓，一部是《鬼谷子》，一部就是赵蕤的《反经》。

《反经》原名《长短经》。长短一词，在我国的传统语汇中，有多重含义，一般泛指是非、得失、长短、优劣等。西汉游说韩信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的蒯通，《史记》称他“善为长短说”。人称“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短，归此为长”，因此《战国策》这部专讲纵横谋略的书又有《长短书》之别称。赵蕤《长短经》一书的命名即由此而来。正如《四川总志》所说，赵蕤“博考六经诸子同异，著长短经”十万余言，博征经史，广采百家，而中心意旨却在于“论王霸机权、正变、长短之术”。纪晓岚撰写的《四库全书·〈长短经〉提要》说：



反 经 新 译 新 注



再 版 序



反经新译新注



再版序

“此书辨析事势，其言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固不悖于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悦《申鉴》、刘邵《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唐人著述，世远渐稀。虽佚十分之一，固当全璧视之矣。”

这次我们编译赵蕤的这部谋略专著时，将原书名《长短经》改用为《反经》，一则因原著本来就有“反经”一章，而且这一章是全书的中心、精华；再则取《反经》为书名，较《长短经》更为通俗醒目。至于这样做是否有背于古籍整理之规则，这要一看是否为读者认可，二看是否有先例。我们知道，太史公司马迁写毕《史记》，给出的书名原本是《太史公书》，《史记》是后人的命名；《红楼梦》原名《石头记》，现名是在乾隆年间，由程伟元和高鹗以木活字排印行世时给出的。此类例证尚多。古人可以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关键要看，这样做是否对读者更方便，对原著传播更有益。

《唐书·艺文志》言：“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是书皆谈王伯经权之要，成于开元四年。自序称凡六十三篇，合为十卷。”《唐书》与晁公武《读书志》所言卷数并同。明洪武时沈新民《跋》称其“第十卷载阴谋家本阙，今存者六十四篇”云云。然现仅存九卷。佚其一卷而反多一篇，与蕤《序》六十三篇之数不合。勘验所存，实为六十四篇。疑蕤《序》或传写之误。其第十卷所谓“阴谋”者，今已不可考。

对书名的更改缘由和篇章之残缺作此说明后，我们觉得对《反经》这部谋略专著的特点，更应该作一简要概述，以便读者在阅读之前有一总体印象。

《反经》关于谋略权变的论述，其特点有四：

一、谋略为纲 经史皆备

《反经》是对唐之前历代智谋权术的一次全面总结。书中所征引的前代著述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包，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所引书目中，不少著述今已散佚，如《玉铃经》、吴人张微的《默记》等。因此，从另一角度看，这无疑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



二、结构宏廓 条理分明

正因为《反经》对权谋的总结是全面的,所以具有多层次,多角度,构制严整,规模宏廓的特点。

权谋是一种高智商的积极思维。治国安邦,不知权谋,亡败立至。政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最高艺术,而权谋即是完成这一艺术杰作必备的智慧 and 技巧。贯彻于国家政治活动之始终的权谋,体现在立国守成、富民强国的各个方面,大到政体君道、文功武治,小到测隐识人、循名责实,既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整体,又是一个需要时时相机应变的理性运作过程。作者对于关乎国之兴亡治乱的政治谋略经过系统的研究后,将其条分缕析,归纳成一个层层相因的有机体系,显得井然有序,极有条理。比如作者首论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君之“大体”是以不能驶有能,亦即起用贤能,宏观决策。为政之道在得人,得人之要在任长。领导者善于任用各类人才的长处,就从根本上把握了建功立业的正道。

用人的前提在善于识人。芸芸众生,良莠不齐,所以首先要对形形色色的人群有个基本的分类,何为小人君子,何为英雄豪杰。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标准,用人就是一句空话。

智愚贤庸有了标准,紧接着就是如何量才使用的问题。因材任人,国之大柄;考绩进秩,吏之常法。“欲观其上,必由其下”——精辟深刻地道出了吏治向来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用人也好,量才也好,首先要知人。用人难的根源在于知人难。为解决知人难的问题,作者总结历史上的知人之法,归纳出“观诚”、“听气”、“察色”、“考志”、“测隐”、“揆德”、“察相”等七种方法,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各个领域的决策者如何统御部属的首要的难题。

通览《反经》九卷六十四章,体会各章的中心论点,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全面深刻总结前人关于权谋的所有成果的基础上,是如何将各类问题归纳成一个有机整体的。

三、有理有据 论证充分

“立国之本,刑与德也。”法治德治相辅相成是作为最高统治者须臾不可偏废的治国大纲。所谓德治,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高尚的德行教化、感化臣民,使全国人民降心服志,从而逐渐形成甘愿为国效



反 经 新 译 新 注



再 版 序



反 经 新 译 新 注



再 版 序

命、无私奉献的道德风尚。然则有德无刑，人臣会渐生涣散贪妄之心，奸凶腐败必将滋蔓。因此，统治者既要宽仁大度，以德服人，又要严肃刑法，赏罚分明。德刑赏罚，都要出以公心。恩威并施，刚柔并用，宽猛相济，实质上就是将物质与精神、法规与权变、强制与感化等看似相互抵触，实则相辅相成的统治手段巧妙地交替使用。正如拿破仑所说，统治的秘诀就在于对自私与恐惧的巧妙利用。德刑相济，正是针对人类自私与恐惧这两种最原始的本性所采取的最有效的统治方法。

为了证实这一千古不易的论点，《反经》的作者例举了两汉至隋唐的历代皇帝，用丰富的史实说明德刑赏罚是怎样关系到国之兴衰的。通过这些皇帝的得失成败，作者为我们总结出这样一条历史规律：开国之君大多是雄才伟略的明君。一俟天下平定，百业俱兴，守成之君不是变成残害忠良的暴君，就是坠落为奸臣弄权的昏君。这种历史规律，就其客观原因而言，是因为前者大都崛起于草莽，深知民间疾苦，善于总结历朝历代兴衰成败的根源，故能体察民情，爱护人才，勤于政事，明于吏治；后者则“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相反，因此国破家亡接踵而至。就其主观原因而言，开基创业的人君大都胸襟开阔，豁达大度，能虚己应物，有载天覆地的气量，正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相反，昏君和暴君则视臣民如寇仇，视天下为私有，这样的国君，耶有不亡之理！

对于历史名臣的评价，《反经》贯彻了同样的观点。作者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把他们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给予公正客观的评述。如对白起，虽然他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长平一战，坑杀赵卒四十多万，但赵蕤对白起进行了强烈的谴责，锐利的抨击，其评价是完全否定的；乐毅连下齐国七十城，最后还是失败了，但作者认为乐毅的志向决不在于消灭齐国，而是要一统天下。乐毅是一个具有帝王之志的悲剧型人物。

作者摆脱了粗浅地只以忠奸评价历史人物的传统定式，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当时国与国格局高度来俯瞰审视历史上的所有臣子，把应当肯定的分为圣臣、大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六类，谓之“六正”；应当否定的分为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六类，谓之“六邪”。然后作者列举了历史上有过争议的三十多位名臣，一一给予客观公正的评议，读后对人启发殊深。



四、逆向思考 发人深省

《反经》的作者在通过君德、臣行、人才、理乱、适变、机遇这一系列重大历史课题阐述谋略在政治军事中的作用时,使用了一种十分睿智的思维方法——逆向思维。正是在这种思维方法的统摄下,使《反经》一书妙论纷呈,精辟绝伦,读之让人不自禁频频掩卷沉思。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虽然被推崇为不容怀疑的五帝三王的治世之要,然而赵蕤纵观历史,发现这八大治国之术无不存在着流弊。他指出,仁爱讲过了头,很容易导致伪善;礼仪太繁琐了,会让人丧失本色;社会太重视名声,就会产生劫夺的野心;过于注重刑罚,执法人员就要以强凌弱……

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决策者在拟定制度、法规时,很容易走入这样一个误区,那就是只想到一项决策积极的、理想的一面,而忽视了这一决策在运行时必然会产生的反弹以及始料不及的变数。简言之,决策者对他的决策只知其正,不知其反。其结果,必然被弄得手足无措,顾此失彼,矛盾重重,人心背离。决策者应当知道,任何一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都要逐渐暴露其弊端,直到最后走向反面。这就是《反经》一书中心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反经》一书的灵魂也全在这个“反”字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坏。我们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坏的因素已经在里面滋生了。譬如一个人春风得意,得意就忘形,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了;当一个人失败时,失败是成功之母,未来新的成功种子,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败的机遇。

其次所谓“反”,是指任何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好坏,因此看历史,看政治制度,看时代变化,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我们拟定一项政策,处理一个案件,拿出一部法规来,都是针对当前存在的弊端,当时来看,相当完美。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其负面作用就开始逐渐暴露出来了,如不及时纠偏,最后可能完全走向反面。真正懂了其中的道理,第一等人晓得事情要变了,把握先机引领变革;第二等人变化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变都变过了,他还在那里守城,结果被时代抛弃了。

对立统一,反面教材,立场交换等等说法与思维模式,都接近了人们思维方法中的这个盲点——逆向思维,但还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



反 经 新 译 新 注



再 版 序



因此我们习惯了绝处逢生、逢凶化吉之类的企盼。然而这仅仅是等候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消极期待,而不是积极地去从失败中寻找、培植成功的因子,或者在兴旺发达时及早发现衰败的隐身内核,从而尽快予以补救。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把《资治通鉴》当作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却忽略了以反为经、更重实用的谋略宝典——《反经》。当然,这并不是说正面思考方式是错误的,而是说一成不变地执迷于这种近乎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必然会妨碍逆向思维所产生的新奇美妙。譬如 $1+1=2$ 这个等式吧, $1+1$ 的正面思考的答案只能是2,它是惟一的。可如果我们反过来问,2的得数是怎样产生的?那它的构成因素可以说是无穷的, $1+1$ 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换言之,当正面思维处于狭隘时,逆向思维往往会激活意想不到的灵感,打开更加广阔的天地,发现更多美不可言的希望。在生存与发展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残酷的今天,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每个人都面临着强与弱的考验,生与死的交锋,富与贫的折磨。《反经》的问世,不是为我们揭示了一条更有希望迈向成功、富强的捷径吗?

与时俱进读《反经》

唐人赵蕤在运用逆向思维方法对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展开论述的时候,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其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自然显得既生疏又遥远。然而,《反经》所使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论证的政治观点,却并没有过时。任何思想,只要经实践检验符合真理,就永远是常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历史巨变,使《反经》这部被历代统治者秘而不宣、用而不言的经世奇书大白于天下,焕发出了它惊世骇俗的生命力,既激发了许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暂时成功的胜利者再创辉煌的信心,也激励了更多的失败者东山再起的勇气。《反经》的智谋权变为从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俊杰们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谋略武器,而逆向思维的方法又为他们的事业展示了无限生机。实践证明,《反经》一面世,就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得到了普遍认同,完全是由于它特有的实用价值决定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有效地遏制贪污腐败的滋生蔓延,我们不是从赵蕤的吏治思想中也能得到有益的启示吗?



反 经 新 译 新 注



再 版 序



反 经 新 译 新 注



再 版 序

在人们逐渐认识到事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时,《反经》的人才观不是很有参考价值吗?

知识产权、文凭职称固然标志着文化的进步,却也引发了令人齿寒的学术腐败。这不正好验证了赵蕤引述庄子的那个盗墓窃珠的故事吗?

当我们实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时,如果能多一点逆向思维,及早制定一套不让先富起来的大款们偷税漏税,又让弱势群体得到应有的社保福利的政策,不是可以减缓目前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吗?

当我们加大国有企业的改制力度时,如果多一点逆向思维,对下岗待业的职工提前开辟一些再就业的门路,不是可以大大减少后来出现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吗?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少人成了大公司的老板。不管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方法走到这一步的,眼下他们一致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严峻挑战:创业之后如何守成,守成的同时如何再发展?而《反经》恰恰在这方面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锦囊妙计。

经营管理目前已经成为商战中直接关系到一个企业存亡兴衰的重大课题。经营管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各项规章制度的策定。那么,在出台任何章程之前,一定不要忘了《反经》的忠告:它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弹?又如何事先采取纠偏救弊的措施?

无论你是在政界还是商界,都要受到人际关系的困扰。比如你常常慨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你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个别事例恰恰与此相反;你有恩于人,对方却不是得寸进尺,就是恩将仇报;你对人以诚相待,换来的却是恶意中伤;你付出很多,得到却很少,而无私索取,却有丰厚的回报……怎样正确理解、明智处理这些人生的烦恼?只要读了《运命》、《恩生怨》、《忠疑》、《大私》等章节,你一定会豁然开朗,如获至宝!

总之,《反经》无论对我们建功立业还是为人处世,都有奇妙的实用价值。

自从我国加入 WTO,以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以来,归纳总结《反经》的诸多实用价值,最终可能要归结到现代管理学上来。2001 年,获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管理科学博士学位、现任台湾守义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薄乔萍从《反经》中发现了许多现代管理丛



书中很少提及的精彩内容,大大激发了他的灵感,因而撰写了一本现代管理学专著:《逆向思考:〈反经〉的管理应用》。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谊在读过《反经》和薄教授的专著后,觉得《反经》的“最重要的感受最深的:一是管理体制,二是统率之道,三是知人善任”。接着,他以一位统领国际知名大企业老总的切身体会,谈到《反经》一书在这几方面对他的有益启迪。因此我们说,从政学用《反经》,志在造福苍生;经商学用《反经》,方可再创辉煌;治学学用《反经》,才能学以致用,——这决非夸大其词,言过其实。关键在看你是否善于把握与时俱进读《反经》的诀窍。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次名为再版,实则几乎全部是重新编译。与初版相比较,在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

一、原著在卷一至卷三集中论述政治学与卷八论述社会学的中间,插入卷四概述两汉、魏晋和南北朝史;卷五述战国;卷六述三国。这次我在章卷的编排顺序上略作调整,将卷七与卷八提前,四、五、六卷置后,页码按调整后的顺序编排。

二、初版时为方便读者,未加注释。这次考虑再三,觉得为帮助读者正确地理解原文,对历史上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名臣将相和学者名著,以及过于生僻的词语,还是予以简要注释为好。

三、初版所加的“按语”,思虑再三,还是都删除了。因为这类肤浅的一孔之见,未必对读者有多大的启发。评议不当,反而会影响读者自己创造性的领悟和理解。

这些都与初版有很大的不同,有必要在此向读者有所交待。

陈 伉

于 2003 年冬

再
版
序



原 序

唐·赵 蕤

制作车子的人,惟恐别人不富贵,没人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伤人,没人买他的箭。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不是的,这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从这些日常生活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热衷名利的读书人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兵法奇谋的人,都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它的弊端,于是创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奖美德。防微杜渐,预先对可能出现的弊端要有所制约。这就是圣人创作、著述的根本用意。

但是,制定一种方针、政策运用于治理国家,当这种方针、政策出现弊端时必定会出乱子。如果到出了乱子的时候,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圣人、先哲虽然具有同样的风范,但一代代帝王的业绩却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因时因地确定自己的教化方略,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而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摄的手段;强国的统治采取胁迫的办法。各有各的招数,彼此不能随便替换。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应